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天演论》

欧阳哲生

[提要] 严复的译作《天演论》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产生重大影响的经典著作之一。本文围绕严复思想与赫胥黎、斯宾塞之间的关系，《天演论》与严复维新思想之间的关系，《天演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问题，作了新的解读。

[关键词] 严复 《天演论》 赫胥黎 斯宾塞 维新思想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 (2006) 02—0099—08

中国近代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主要依循两条路子：一条是推陈出新，即在中国传统经学（儒学）内部，发现与时代相结合的思想生长点，从中国传统学术的内在理路出发，提出具有时代意义的新思想、新理论、新学说，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学派和自称“返本开新”的现代新儒家走的即是这条路子。一条是援西入中，即通过传播、译介外来思想理论，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输入新的血液，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维新、变革理论和建构新的思想系统，严复可谓这条路子的第一个典型代表。

近人论及中国近代思想历程时，无不交口称赞严复在译介西方思想理论方面的贡献。梁启超在评及晚清思想界的状况时说：“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图亚丹《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①。1923年12月蔡元培论及近50年来中国哲学发展历程时，给严复的定位是：“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②。胡适述及晚清翻译史时，对严复亦有高评：“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③。毛泽东论及近代中国思想时，将严复置于“先进的中国人”这一行列：“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④。这些不同政见、不同党派的代表人物对严复历史定位所形成的共识，表明严复在介绍西方思想理论方面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已为举世公认。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位居严译名著之首，因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自然也就成为百余年来人们不断解读、诠释的经典文本。

一、在赫胥黎与斯宾塞之间

在评析《天演论》时，研究者们最为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严复为什么要翻译《天演论》？他翻译此著想要向世人传达的信息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一直为人们所争论的问题。作为一部西方学术著作，赫胥黎原作的意旨应该说是非常明确的，但因严复在翻译过程中所作的调整和所加案语，使原作与译作的意义产生了差异，其中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与他在案语中同时介绍的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间的关系，是研究者们讨论《天演论》时最关切的问题。

史华慈认为：“《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为严复介绍他所理解的斯宾塞的进化论哲学提供了一个出发点，而赫胥黎则几乎成了斯宾塞的一个陪衬角色。在探讨过程中，严复自己所作的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和伦理的案语已使这一点很明确了。最重要的是，正是在《天演论》中，他十分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它所包含的伦理的深深信仰。他清醒地知道这一伦理暗示了在中国将有一场观念的革命，现在他的注意力之所向正是这场革命”^⑤。这一观点遭到汪荣祖先生的反驳，汪认为：“严氏固然不完全赞同赫说，亦非全盘否定，自非只因其简短而译之。”“我们不必视严氏案语尽是在发表他本人的意见，引入案语，不仅订正赫说，而且补充说明，以获致他认为较为平衡的观点。”“我们实在无须采取非杨即墨的观点，把严氏定位于斯宾塞。严复一心要把他所理解的天演论说清楚，是十分显而易见的，实在没有必要囿于一家之说，吴汝纶序言中所谓‘天行人治，同归天演’，实已道出译者汇合赫、斯二说的微意”^⑥。近又有论者提出新见，以为“Evolution and Ethics 决不是讲解生物进化论的科普读物，而是提倡美德、调和人际关系的伦理学著作。尽管书中列举了不少生物界的事例，但它们只是一些通俗的比方，是为了让读者容易理解并接受自己的社会伦理思想。由此推论，严复之所以翻译赫胥黎的著作而不去翻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其用意就是为了引进这种新型的伦理思想。只是由于赫胥黎的社会伦理思想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之上，因此在引进这种伦理思想的同时，必然要做普及进化论的工作”^⑦。

细读《天演论》，提到斯宾塞名者有《自序》，正文中有导言一（此处为严复所加），案语中有卷上导言一、二、五、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卷下有论五、十五等处。直接提到赫胥黎名者有《自序》，案语中有卷上导言一、三、四、五、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卷下有论一、九、十三、十五、十六等处。应当说明的是，书中其它处虽未提及赫氏之名，实为讨论《天演论》本身者则几乎贯穿全书的案语。而涉及比较斯、赫两氏学说的地方有《自序》，案语中有导言五、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卷下中的论十五等处。从赫胥黎、斯宾塞的名字出现在《天演论》中的频率之高，可见对他俩的思想评价确是严复译著此书的重点所在。这里我们试将《天演论》中涉及赫胥黎、斯宾塞的文字分作三类处理。

第一类是严复赞扬斯宾塞的文字：

有斯宾塞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自序》）。

斯宾塞者，与达同时，亦本天演著《天人会通论》，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其说尤为精辟宏富。……呜呼！欧洲自有生民以来，无此作也。斯宾塞迄今尚存，年七十有六矣。其全书于客岁始蒇事，所谓体大思精，殚毕生之力者也（《导言一察变》案语）。

斯宾塞著天演公例，谓教学二宗，皆以不可思视为起点，即竺乾所谓不二法门者

也。其言至为奥博，可与前论参观（《论五天刑》案语）。

第二类是严复赞扬赫胥黎的文字：

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自序》）。

此篇所论，如“圣人知治人之人，赋于治于人者也”以下十余语最精辟（《导言八乌托邦》案语）。

赫胥黎氏是篇，所谓去其所傅者最为有国者所难能。能则其国无不强，其群无不进者（《导言十七善群》案语）。

此篇及前篇所诠观物之理，最为精微（《论九真幻》案语）。

……赫胥黎氏以理属人治，以气属天行，此亦自显诸用者言之。若自本体而言，亦不能外天而言理也，与宋儒言性诸说参观可矣（《论十三论性》案语）。

第三类是严复比较赫、斯二氏的文字：

于上二篇，斯宾塞、赫胥黎二家言治之殊，可以见矣。斯宾塞之言治也，大旨存于任天，而人事为之辅，犹黄老之明自然，而不忘在宥是已。赫胥黎氏所著录，亦什九主任天之说者，独于此书，非之如此，盖为持前说而过者设也（《导言五互争》案语）。

赫胥黎保群之论，可谓辨矣。然其谓群道由人心善相感而立，则有倒果为因之病，又不可不知也。……赫胥黎执其末以齐其本，此其言群理，所以不若斯宾塞氏之密也。且以感通为人道之本，其说发于计学家亚丹斯密，亦非赫胥黎氏所独标之新理也（《导言十三制私》案语）。

赫胥黎氏之为此言，意欲明保群自存之道，不宜尽去自营也。然而其义隘矣。且其所举泰东西建言，皆非群学太平最大公例也。太平公例曰：人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用此则无前弊矣。斯宾塞《群谊》一篇，为释是例而作也（《导言十四怒败》）。

赫胥黎氏是书大指，以物竞为乱源，而人治终穷于过庶。此其持论所以与斯宾塞氏大相径庭，而谓太平为无是物也。斯宾塞则谓事迟速不可知，而人道必成于郅治。……自其说出，论化之士十八九宗之。夫种下者多子而子夭，种贵者少子而子寿，此天演公例，百草木虫鱼，以至人类，所随地可察者。斯宾氏之说，岂不然哉（《导言十五最旨》）？

有国者安危利害则亦已耳，诚欲自存，赫、斯二氏之言，殆无以易也。赫所谓去其所傅，与斯所谓功食相准者，言有正负之殊，而其理则一而已矣（《导言十七善群》）。

则赫胥氏是篇所称屈己为群为无可乐，而其效之美，不止可乐之语，于理荒矣。且语不知可乐之外，所谓美者果何状也。然其谓郅治如远切线，可近不可交，则至精之譬。又谓世间不能有善无恶，有乐无忧，二语亦无以易。……曰：然则郅治极休，如斯宾塞所云去者，固无可乎？曰：难言也。大抵宇宙究竟与其元始，同于不可思议（《导言十八新反》案语）。

通观前后论十七篇，此为最下。盖意求胜斯宾塞，遂未尝深考斯宾塞之所据耳。夫斯宾塞所谓民群任天演之自然，则必日进善不日趋恶，而郅治必有时而臻者，其坚义至坚，殆难破也。（《论十五演恶》案语）

从上述所列严复在案语中对赫胥黎、斯宾塞的评价和对他俩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在

第一类文字中，严复赞扬斯宾塞尔的“贯天地人而一理之”的天演论，推崇他的群学，这是他继而翻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的主要动机。在第二类文字中，严复准确地把握到《天演论》的精意在于“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对于赫氏的“两害相权，己轻群重”或“群己并重，则舍己为群”的“善群”思想推崇备至。在第三类文字中，严复一方面试图拉近赫、斯两人的思想差距，指出两人均有“任天而治”的思想，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中之所以特别强调“人治”，是“盖为持前说而过者设也”。一方面也点出赫、斯两人的思想区别所在，严复确实也表现了对斯宾塞尔思想的偏好，但这种“偏好”应视为他对赫胥黎思想的补正，而不是推翻。史华兹先生以为“说《天演论》是将赫胥黎原著和严复为反赫胥黎而对斯宾塞主要观点进行的阐述相结合的意译本，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的看法^⑧，显然有夸大严复偏向斯宾塞之嫌。当然，如要全面理解严复对斯宾塞尔思想的把握，则仅取《天演论》显然是不够的，还应联系严复其它的论著和译作，这非本文讨论的范围所及，在此不作赘述^⑨。

二、《天演论》与严复的维新思想

《天演论》的轰动效应，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严复把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或者说，严复对赫、斯两氏理论的译述，使国人产生对自己境遇的联想，并迸发出自强、维新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天演论》与其说是严复翻译的西方学术著作，不如说是他为维新运动锻造的思想利器，其现实意义远远高于学术意义，事实上受到这部书感染的国人大都未必能真正理解赫胥黎与斯宾塞之间的理论差异，但他们为书中所使用的“天演”、“物竞”、“天择”、“进化”、“保种”等词汇所震撼，这些在同时代人的记忆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吴汝纶作为《天演论》的第一读者，最早敏感到《天演论》思想对中国自强的现实功用。1896年8月26日他致信严复道：“尊译《天演论》，计已脱稿，所示外国格致家谓顺乎天演，则郅治终成。赫胥黎又谓不讲治功，则人道不立，此其资益于自强之治者，诚深诚邃”^⑩。1897年3月9日他再次致信严复，对严复的用心表示“钦佩”，“抑执事之译此书，盖伤吾土之不竞，惧炎黄数千年之种族，将遂无以自存，而惕惕焉欲进之以人治也。本执事忠愤所发，特借赫胥黎之书，用为主文谲谏之资而已”^⑪。吴氏“手录副本，秘之枕中”^⑫。《天演论》正式出版时，吴氏在序中称：“今议者谓西人之学，多吾所未闻，欲瀹民智，莫善于译书。”“抑严子之译是书，不惟自传其文而已，盖谓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怵焉知变，于国论殆有助乎？是旨也，予又惑焉”^⑬。如此反复地说明《天演论》对中国“自强”、“保种”的指导作用，可见吴汝纶对它的现实功用的高度重视。

如果我们将赫胥黎的原作与严复的译作加以对比，可以发现阅读原作本身很难与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但是经过严复的译述和案语（其实是阐释和发挥），确有了截然不同的效果，《天演论》仿佛变成了一部指导中国现实改革的理论著作。严复究竟在哪些方面做了改造，使之产生了这样让国人心灵感到呼应的效果呢？

首先，严复所加适合中国读者口味的标题，对是书的宗旨作了新的诱导。如卷上的“察变”、“趋异”、“人为”、“互争”、“人择”、“善败”、“汰蕃”、“择难”、“制私”、“恕败”、“进微”、“善群”、“新反”，卷下的“能实”、“忧患”、“教源”、“严意”、“天刑”、“佛释”、“种业”、“佛法”、“学派”、“天难”、“论性”、“矫性”、“演恶”、“群治”、“进化”诸篇篇名，乍一看这些标题，仿佛它们都是讨论一些与中国现实有关的话题，其实这些新加的篇名，完全是严复据自己对原文的

理解所做的归纳，有些篇名甚至是对原作的结构做了调整后所做的新的归纳。

其次，严复在翻译过程中，考虑到中国读者的阅读、接受习惯，对原作的内容或有所增加，或有所减少，或有所舍弃，或有所改写，使之强化和突显他所欲表达的立意。如《导言一察变》中的结尾处所加“斯宾塞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这段话意在点明“物竞天择”之理，也是全书的宗旨所在。又如《导言八 乌托邦》中的“故欲郅治之隆，必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故又为之学校庠序焉。学校庠序之制善，而后智仁勇之民兴，智仁勇之民兴，而有以为群力群策之资，而后其国乃一富而不可贫，一强而不可弱也”^⑩一段，亦非原作所有，而是严复“借”赫胥黎的口发出自己的改革呼喊，它与严复在此前发表的《原强》一文所表达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强调发展教育的维新思想如出一辙，是其认定的拯救中国之路。

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原作中并没有中国人名、地名，更没有引证中国典故，但严复在翻译时，却改变原文，采用中文典故和中国人名、地名表达，以增加《天演论》的可读性。如卷上《察变第一》篇中“即假吾人彭、聃之寿，而亦由暂观久，潜移弗知。”此处的彭、聃，即彭祖、老聃，相传为中国古代的长寿者。《制私第十三》篇中“李将军必取霸陵尉而杀之，可谓过矣。然以飞将威名，二千石之重，尉何物，乃以等闲视之？”此处的李广为汉武帝时抗击匈奴的名将。卷下《能实第一》篇中“又如江流然，始滥觞于昆仑，出梁、益，下荆、扬。”这里的昆仑山为中国名山，梁、益、荆、扬则为中国古代地名。为了寻求与英文对应的中文概念，严复可谓煞费苦心，如 selection (天择)、evolution (天演)、state of nature of the world of plants (天运) 等，这些都是颇具创意的译文。严复自谓：“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⑪。

再次，严复以案语的形式，加入自己的思想阐释或对原作的补充，为读者沿着他指引的思想方向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进化论与伦理学》原是赫胥黎阐述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和自己的伦理学之间关系的著作。但严复在翻译时，加进了大量的案语。这些案语大大丰富了全书的内容，更便于中文读者对原作的理解。严复的案语就其内容来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借案语介绍斯宾塞的思想理论，并以之与赫胥黎的理论进行对比，使读者对达尔文主义的两支——赫胥黎与斯宾塞，有比较清晰的了解。二是在案语中介绍与正文内容相关的西学背景知识，包括一些人物、地名的注释，如在卷上《趋异第三》篇的案语中介绍马尔达（即马尔萨斯）的经济学说，在卷下《教源第三》篇中提到古代希腊哲学家德黎（即泰勒斯，前 624~前 547 年）、亚诺芝曼德（即阿那克西曼德，前 611~前 547 年）、芝诺芬尼（即色诺芬尼，前 565~前 473 年）、巴弥匿智（即巴门尼德，约前 6 世纪末~前 5 世纪中）、德摩顿利图（即德谟克里特，前 460~前 370 年）、苏格拉第（即苏格拉底，前 469~前 399 年）、亚里斯大德（即亚里士多德，前 384~前 322 年）、阿塞西烈（即阿塞西劳斯，前 315~前 241 年）等，在卷下《真幻第九》篇中介绍法国哲学家特嘉尔（即笛卡尔，1596~1650 年）等，以增进中文读者对原作的理解。三是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借题发挥自己的见解，以使中国读者从《天演论》感受到严复本人的思想见解。故对这类案语的解读，也有助于理解严复的维新思想。

在案语中，严复多次将西方学理与中土学术联系起来加以比较，如把斯宾塞的“大旨存于任天，而人事为之辅”的思想比附为“黄老之明自然”^⑫。以为赫胥黎的“以理属人治，以气属天行”与宋儒言性之说相同^⑬。把先秦的孔、墨、老、庄、孟、荀诸子与古代希腊的“诸智”相对应^⑭。把卷下《天刑第五》篇与《易传》、《老子》作“同一理解”^⑮。凡此例证，说明严复有汇通

中西、中西互释的意向。应当说明的是，严复这种将西方学理纳入中土学术的框架来处理，并不符合赫胥黎、斯宾塞的原意，甚至有伤原作的本意，但在国人缺乏西学知识的背景下，有助于中国士人对《天演论》的理解。

为唤醒国人，刺激国人麻木的心灵，《天演论》中的案语多处表现了严复“保种”救亡的忧患意识。如以墨（美）、澳两洲“土人日益萧条”的事实，向国人发出强烈的呼吁，“此洞识知微之士，所为惊心动魄，于保群进化之图，而知徒高睨大谈于夷夏轩轾之间者，为深无益于事实也”^②。以美、澳土著“岁有耗减”的惨痛结果提醒国人不要再做“泱泱大国”的美梦，“区区人满，乌足恃也哉，乌足恃也哉！”^③感叹“中国廿余口之租界，英人处其中者，多不愈千，少不及百，而制度厘然，隐若敌国然。”而“吾闻粤民走南洋洲者，所在以亿计，然终不免为人臧获，被驱斥也”^④。从古代印度、希腊和近代欧洲的“风教”与“国种盛衰”中，严复看到当时的世界“若仅以教化而论，则欧洲、中国优劣尚未易言。然彼其民，好然诺，贵信果，重少轻老，喜壮健无所屈服之风。即东海之倭亦轻生尚勇，死党好名，与震旦之名大有异。呜呼！隐忧之大，可胜言哉？”^⑤诸如此类的事例，生动、具体地说明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原则。

严复在翻译和案语中所做的“中国化”工作，大大加强了译作的现实感，在经历了中日甲午战败的巨大创痛之后，《天演论》所传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对中国读者的冲刺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许多读者阅读该书时不知不觉地产生共鸣，顺其思路思考民族和国家的前途，或投身维新热潮，或走上革命之路，一场波浪壮阔的变法维新运动终于在这里找到了自己最有力的理论依据。

三、《天演论》的历史作用评估

严复翻译《天演论》，对自己有不同于一般译品和翻译家的要求，表现了超乎寻常的雄心，他既想将这本“新得之学”、“晚出之书”介绍给国人，借此显示自己超前的思想；又想将西学与中学熔于一炉，把赫胥黎所表达的思想以一种最能为当时高级士大夫所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他既要作一种学理的探讨，以《天演论》为中心展现自己渊博的西学学识；又欲借外来的学理来剖析中国的现实和世界的大势，寻求中国维新、自强之道。他既提出了一种新的翻译标准，为中国译界译介西方学术著作提供一种不同于传统翻译佛典的新模式；又逢迎“桐城派”的文学审美趣味，以一种古奥、典雅的译文进行创作。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定位如此之高，以至它长久被人们奉为典范，故其在近代中国的诸多方面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在近代中国，对土人心理产生震撼性效应的第一本西书当是严复译述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在此之前，近代译书事业始于江南制造总局的译书局和一些来华传教士，当时的译书范围，第一类是宗教书，主要是《圣经》的各种译本；第二类是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书，时人称之为“格致”；第三类是历史、政治、法制方面的书，如《泰西新史揽要》、《万国公法》等。而文学、哲学社会科学类的书则付诸阙如，对这一现象，胡适的解释是“当日的中国学者总想西洋的枪炮固然厉害，但文艺哲理自然还不如我们这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了”^⑥。中国人翻译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当从严复的《天演论》始，而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则从林纾始，康有为所谓“译才并世数严林”，说的就是严、林两人在当时译界的这种地位。

《进化论与伦理学》原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 1893 年 5 月 18 日在牛津大学罗尼斯讲座讲演时的文稿，初版于 1893 年，增订本出版于 1894 年，严复的翻译工作始于 1896 年，最早发表于

1897年，中译本与原作的出版时间相差不过二、三年，几乎是同步进行，可以说《天演论》是将西方最新的前沿学术研究成果介绍给国人的创试，从此中西文化学术交流工作在新的平台上同步进行，改变了以往中译本作品以陈旧的西方宗教经典和较低层次的自然科学作品为主的局面。

《天演论》是严复独立翻译的中文译本，也可以说是国人独立从事翻译西方学术经典著作的开始。在此之前，译书主要采取西译中述的办法，此办法如傅兰雅所述：“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②。这种中西合作的办法相对来说有较大的局限性，它实际上是当时外国人不精通中文，中国人不熟谙外文所采取的一种权宜的、便通的翻译办法。严复以其兼通中、英文，对两种语言的会通之处了然于胸，从事翻译，这是国人在近代翻译史上的一大突破。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翻译的标准为信、达、雅^③，并躬行实践，亲自示范，其译文虽因效法周秦诸子，过于古雅；译文本身因只求“达旨”，过于随意，但毕竟已为中国近代翻译提出了新的可供操作的规范，而严译所取的意译方式，实际也在译界风行一时，成为近代中国继第一阶段“西译中述”之后第二阶段的主要翻译方式。对此，贺麟曾评价道：“他这三个标准，虽少有人办到。但影响却很大。在翻译西籍史上的意义，尤为重大；因为在以前，翻译西书的人都没有讨论到这个问题。严复既首先提出三个标准，后来译书的人，总难免不受他这三个标准支配”^④。“五四”以后，译界虽多取直译方式，对严译所用的古文基本摒弃，对严译的意译方式多有批评，对直译意译的优长亦各有所见，对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标准也意见分歧，但严复作为一个翻译典范在近代翻译史上的地位则为人公认。

《天演论》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新时代。在此之前，人们的社会历史观受传统的历史循环论和“天道观”的影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10多年间，《天演论》可以说是中国最为流行的译著。据曹聚仁回忆：“近二十年中，我读过的回忆录，总在五百种以上，他们很少不受赫胥黎《天演论》的影响，那是严氏的译介本。”“如胡适那样皖南山谷中的孩子，他为什么以‘适’为名，即从《天演论》的‘适者生存’而来。孙中山手下大将陈炯明，名‘陈竞存’，即从《天演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语而来。鲁迅说他的世界观，就是赫胥黎替他开拓出来的。那是从‘洋鬼子’一变而为‘洋大人’的世代，优胜劣败的自然律太可怕了”^⑤。曹聚仁列举的胡适、陈炯明、鲁迅三个人都是在20世纪初读到《天演论》这本书，并受其影响。而比这些人更长的一辈吴汝纶、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等则是在19世纪末的读者了。20世纪初，许多新学堂使用吴汝纶删节的《天演论》作为教科书^⑥，其普及率自然大大延伸了。在学术界有一种颇具影响的误会，即以为严译《天演论》是第一本宣传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译著，或者进化论输入中国，是从严复开始^⑦。其实在19世纪70年代至1897年《天演论》问世以前，已有多种经由传教士翻译的格致书籍中夹杂有进化论的介绍^⑧。但《天演论》确是第一本系统介绍进化论并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译著，自《天演论》问世后，进化论在中国知识界蔚然成为一股具有影响力的思潮，许多人步严复的后尘，译介有关进化论的著作，可以说《天演论》是进化论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一块里程碑。“五四”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实验主义等新的外来思想的流行，进化论思潮的影响力逐渐退潮，《天演论》的读者群自然随之也大为缩小，傅斯年、瞿秋白这些“五四”时期崛起的新青年敢于以轻蔑的语气调侃严译《天演论》，这表明作为思想范本的《天演论》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

- 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80页。
- ②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蔡元培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29页。
- ③④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第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1页。
- ⑤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1358页。
- ⑥[美]本杰明·史华慈著，叶美凤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4、96页。
- ⑦汪荣祖：《严复的翻译》，收入汪著《从传统中求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48~149页。
- ⑧俞政：《严复著译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 ⑨有关严复与斯宾塞思想的关系的研究，参见蔡乐苏：《严复启蒙思想与斯宾塞》，载刘桂生、林启彦、王宪明编：《严复思想新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87~314页。
- ⑩⑪《吴汝纶致严复》（一）（二），《严复集》第5册，第1560页。
- ⑫现存吴汝纶所录副本，参见《桐城吴先生日记》（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75~512页。据编者案语“此编较之原本删节过半，亦颇有更定，非仅录副也”。
- ⑬吴汝纶：《天演论》序，收入《天演论》（严译名著丛刊），第7页。
- ⑭《天演论·导言八·乌托邦》，《天演论》第21~22页。
- ⑮《天演论·译例言》，《天演论》，第7页。
- ⑯《天演论·导言五·互争》案语，《天演论》第16页。
- ⑰《天演论·论十三·论性》案语，《天演论》第85页。
- ⑱《天演论·论三·教源》案语，《天演论》第55页。
- ⑲《天演论·论五·天刑》案语，《天演论》第61页。
- ⑳《天演论·导言三·趋异》案语，《天演论》第12页。
- ㉑《天演论·导言四·人为》案语，《天演论》第14页。
- ㉒《天演论·导言七·善败》案语，《天演论》第20页。
- ㉓《天演论·论十四·矫性第》案语，《天演论》第87页。
- ㉔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收入黎难秋主编：《中国科学翻译史料》，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19页。
- ㉕据钱钟书考证，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出自佛典的“信、达、严（释为饰，即雅）”。另钱氏也提到周越然在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读本中提到严复的“信、达、雅”三字诀系受到英人泰勒（Alexander Tytler）《翻译原理论集》（Essays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一书的启示。参见钱钟书：《管锥篇》，中华书局，1991年，第3册，第1101页。
- ㉖贺麟：《严复的翻译》，收入《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2页。
- ㉗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371~372页。
- ㉘参见胡适：《四十自述》，《胡适文集》第1册，第70页。胡适在上海澄衷学堂所阅《天演论》即为教师指定的吴汝纶删节的读本。
- ㉙参见王栻：《严复与严译名著》，收入《论严复与严译名著》，第5页。
- ㉚这方面的情形参见马自毅：《进化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影响——19世纪70年代至1898年》，《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

作者简介：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 江中孝]